

老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辑

唯物主义历史观

第一分册

(内部读物)

老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辑

唯物主义历史观

第一分册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老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辑
唯物主义历史观
第一分册
《哲学研究》编辑部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1964年8月第1版
1964年8月上海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2074·277 定价：0.84元

編者說明

本书是《老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辑。

作者卡尔·考茨基(1854~1939)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首领之一。这本书出版于1927年,是一部集其修正主义观点之大成的长篇著作。原书分一、二两部。由于原书篇幅过大,中译本把它作六个分册出版。

本书系内部读物,公开引用译文时,請仍用原著版本,并請复查原文。

由于我们人力和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卒,翻译上可能有不少缺点,敬希读者指正。

《哲学研究》编辑部

1964年5月

谨将此书献给我亲爱的

路 易 莎

我儿子的母亲，忠实的
同志，我工作中不懈的
知心助手，我们的共同
理想的热情、勇敢的战士

序

本书的完成，偿了我数十年来的宿愿，也满足了很多人对我的期望。

人们总是不断地责备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我们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全部思想和行动的依据，但是至今仍然还没有对这种历史观作出系统的、全面的陈述和论证。这一个缺陷越来越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重要性发生严重的对立，因为马克思主义一年比一年更有力地支配着工人运动，支配着当前的全部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

但是，也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重要性要求它的全体拥护者越来越致力于当前的现实任务，他们几乎无暇从事纯粹理论性的概括工作。

早先，无产阶级斗争的战士们至少有时候会关在监狱里，与世隔绝，或者遇上死气沉沉的反动时期，或者流亡异域，无事可做。马克思只是在流亡中，在一个反动时期，才找到时间著述《资本论》。但是今天在文明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里，我们幸好遇到了这样一个时候，至少对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家来说，那样的强迫休息已经不复存在了，对于阶级斗争的实行家来说，常常也是如此；只有无产阶级尚未充分发展然而反抗性非常强烈的少数几个国家例外，在那种地方，反动和迫害的手段之残酷，是大大地超过早先的反动时代的。那里的被迫害者几乎根本不可能从事任何研究，任何理论工作。

由于个人情况和一般政治情况的特殊凑合，近十年来我才有可能把全副精力用于理论工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建立一个我们至今缺乏的、非常迫切需要的深入的基础。

世界大战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发生分裂，因此在1917年10月间，我被免除了《新时代》的主编职务，到那时为止，那个职务我已经连续不断地担任了三十五年之久。当然我并没有因此就无工作可做。革命的问题，首先是俄国革命的问题，然后是德国革命的问题，使我大为忙碌，与这种活动相连的，又有搜集和出版德国方面有关战争爆发的文件的工作，这些工作要求我在1919年底以前完成。这以后，我才有暇进行我早就想做的那件工作。完成那件工作所需要的时间，竟大大地超过了我的估计。一开头工作进行得倒是挺顺利，虽然由于到格鲁吉亚旅行一次(1920年8月~1921年1月)中断了半年。

1921年10月间，我应邀到哥本哈根大学，在校长阁下奥托·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教授的主持之下作了三次讲演，当时我选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题目，把我所写的书讲了三章。可是不久我就中断了这件工作，去结束我那部讲无产阶级革命的书，在其中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总结了最近一次革命的经验。我在1922年7月间写完了那部书。

当我回头再写《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时候，我已经不再满意自己过去的那种处理题材的方式了。我犯了我们一向进行这一方面工作时所犯的旧错误，我写得太过简略了，过分局限于指出一些线索，同我以前写的那本《伦理和唯物主义历史观》(《Ethik und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一样；那本小册子和我的《自然和社会中的增长和发展》(《Vermehrung und Entwicklung in Natur und Gesellschaft》)一文，是为本书所作的准备工作。

我必须对我过去所要讨论的那些个别的问题作出更深入的论述。因此我抛弃了已经写出的东西，换一个方式重新开始。

可是这时我的健康状况大大地变坏了。我长年患着疟疾，自己还不知道；寒热不时发作，使我很痛苦，因而身体衰弱，工作能力大为降低。由于左眼视力减退，工作能力的降低更形严重；写完《无产阶级革命》的序文以后，接着左眼就失明了。设法挽救左眼的手术是在拉特瑙(Walter Rathenau)遇刺的那一天作的。我估量暗杀的枪声

可能成为再度发动卡普暴动的信号，但是处在那种状况之下，只有一筹莫展地躺在床上。我的右眼还完好，我想今后必须好好保护它。

我眼看着自己的工作象这样衰退下去，疟疾又不断地发作，开始怀疑自己究竟能不能按照新的计划完成这部书。我勾出思想进程的梗概，抽出我认为特别重要的几章来写。我想，万一我的精力过早地耗尽了，也可以留下一个半成品，我的儿子们可以拿它搞出点东西来。

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工作过，抽出来写的几章看来不会有什么用处。

因此我又从头开始，进而按照新的计划一章接着一章有系统地发挥下去，把每一章都完完整整地依次写出来。我这样越往下写，就越发现为了写得完整，势必要阐明一些我一向搁在一边的问题，这些问题我还没有深入地钻研过，必须进行新的研究。还有另一些问题我虽然已经研究过，但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现在还需要根据学术上的最新情况加以鉴定。

因此我的进度只有很慢。但是尽管如此，我终于坚持着把这部作品一直写到了头。

我应当把写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这部书称为全面性的，因为就我所知，它研讨了我们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时所涉及的一切领域。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说，我的作品是最后的定论。任何科学著作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是最后的定论。而且这部作品也不是毫无遗漏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一方面以承认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统一性为基础，另一方面在世界发展的普遍性中指出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为了说明这两者，是必须研究和阐明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领域的，因此在今日的研究状况之下，恐怕要有十几位各方面的专家贡献出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才能给唯物主义历史观作出一个毫无遗漏的阐明和陈述。这大概需要写一部新的百科全书。

我不知道单独一个人今天是否还能够写出这样一部百科全书。我的力量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在我行将就木的这个时候，根本办不

到。

和我所有的著作一样,这部著作我也特别着重写得易读、明了和通俗。当然,这个目标也不是总能达到的。我引证一位作者的时候,必须原封不动地照抄原话,可是并非所有的作者个个力求行文易懂。有人甚至于说康德有意把话说得尽可能晦涩。就是在我自己说话的时候,我也不能总是说得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容易懂。在我这部书里,诚然只有少数几章内容不好懂,可是很不幸,这部书一开头第一卷里就有这样的章节。如果我的读者们一遇着这些困难就不再读下去了,那我是很遗憾的。我在那些困难章节开头地方的正文里已经指出了应当怎样避开它们。

我曾经设法把每一卷、甚至尽量把每一章都写得可以单独地读懂,这样,这部书就容易读一些了。读者用不着把全书从头到尾读下去,如果觉得第一卷太难,甚至于可以把它暂时撇开,直接从第二卷开始读。而且,对于许多对哲学、自然科学和人类学都没有兴趣的人来说,甚至于从讨论国家和阶级的第四卷读起都是可以的,那一卷所讨论的领域,是人们通常探求马克思主义时所注意的唯一领域。

可是,要充分地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毕竟有必要通晓全部五卷,而且只有读懂了前面的几卷,才能充分地掌握后面的每一卷。

我在第一卷后面附了一篇1876年所写的一直没有发表的文章,在第二卷后面附了两篇八十年代初所写的较长的文章,作为附录。我把后两篇文章重新印出来,并不是想借此表明我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与我今天的观点十分接近。为了证明那一点,我是不必费那么多的篇幅的。我在第二卷后面重印那两篇文章的动机不是这样的。我一直不曾再有机会象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样深入地研究第二卷里所讨论的那些领域。在那个时候以后,虽然我多次地在这些领域中得到了与那时不同的成果,但是当时所写的文章里毕竟包含着大批例证,我觉得这些例证今天对于支持和说明我的观点还是很重要的。

因此我现在重新发表了其中的两篇文章。除了这两篇以外,我

本来还想再附上几篇当时所写的文章,这些文章早已见不到了,与本书所发挥的论点是有联系的,例如《婚姻和家庭的发生》(《Entstehung der Ehe und Familie》)(载1882年《宇宙》(《Kosmos》)),《艺术和文化》(《Kunst und Kultur》)(载1884年《塑造》(《Plastik》)),以及论贡普洛维茨(Ludwig Gumplowicz)的文章(《一位唯物主义历史家》(《Ein Materialistischer Historiker》)),载1884年《新时代》(《Neue Zeit》))。但是那样做就很不恰当地扩大了本书的篇幅,所以我不得不放弃了那个打算。

我这部书的结构决定了书中有许多问题要在不同的地方反复出现,并且必须反复加以论述。由于这种情况以及写作的时间很长,我难免写出很多重复的话。在最后定稿的时候,我把这种重复之处大加删削,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有意地留下了不少。这些重复总是显得与陈述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而很难删去。同时我也相信它们甚至会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因为一部篇幅这样大的书是只有少数读者会从头到尾读的,我们不能指望读者读后面的章节时经常记得前面的命题的词句。要读者参阅前文,强迫他去翻查那些地方,那是很麻烦的。因为把前面已经发挥过的论点在后面再重复一次,对于读者来说要方便些。而且这种重复是出现在不同的联系中的,这就使同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得到探讨,从而显示出它的多面性。

此外,我有时还在另外一个意义下不得不重复。因为我的陈述必须表达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切方面,所以我不能总是提出新的思想。我必须经常地复述业已熟知的思想,亦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那些思想,以及我自己过去已经发展过的不少思想。但是,由于我不是编教科书,我感到自己没有义务对一切思想都按其重要程度详细地加以论述。在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说、也没有误解的危险的地方,连重要的思想我也只是简短地论述。反之,在有新的东西提出、并且需要解除纷争的地方,尽管是次要的问题,我也往往论述得非常详细。

在我有意识地采用别人的思想的地方,如果所采用的并不是众

所周知的、已经成了老生常谈的思想，我就把出处指出来。尽管引证的习惯现在已经很不时新，引号和脚注已被认为陈旧不堪，枯燥无味，我还总是不能摆脱这种古老的习惯。为了炫耀渊博而繁征博引固然可笑，但是仍然有许多理由使我们很愿意引证某些作者的言论。

我当然没有把这部书里利用过的一切著作都举出来。要做到那样，我势必要把自己半个世纪以来所读过的书籍全部列出，可是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已经不在手中，甚至我从其中作出的摘录也遗失了。另一方面，我也必须承认，我不可能为了我所讨论的每一个问题而把一切有关的著作统统仔细研究过。这样的要求是只能对有一定范围的专题论文提出的。我的引证既不会表明当时存在着哪些与这个讨论对象有关的文献，也不会告诉大家我曾经利用过哪些书。

大致说来，我认为在下述的情况下引证别人的著作是恰当的：一种情况是我在一位著者的文章里发现了一种值得重视的思想，或者一种说得特别巧妙的思想，我认为值得把它复述出来。因为我认为有义务在复述的时候指出这一思想或言语的创立者，以表谢意。我不能同意另外一些著者的作风，他们在文献中遇到任何巧妙的思想，就仅仅因为自己吸取了它而把它视为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些先生和女士们大概怀着一种信仰，认为自己的一切思想和全部知识全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他们以为向别人学到过东西是非常可耻的。

另一个引证的原因在于有人提出一项主张，这项主张读者可能会觉得奇特，但是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主张，而是与一些大家公认的专家的意见一致的。引证这些专家当中某一位的话，可以消除许多疑虑。

另一方面，在进行驳斥的场合，也会有引证的必要。除非驳斥的是众所周知的观点。

有些命题的词句并非人人都记得，并且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在抨击这种命题的时候，如果不把批判者所攻击的话确切地描画下来，甚至连实际上所指的是哪一个作者都不让人知道，我觉得那是很不

应当的。

我认为我在批判一位作者的时候，不仅有必要实实在在地引证他的话，而且有必要经常把引文的出处确切地指出来。因为批判者有义务向读者提供核对引文的便利。我自己就曾经经常地咒骂很多作者，他们说什么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可以找到这个或那个命题，却不进而指出这个命题在什么地方。如果那不是个大家熟知的地方，多半是根本无法找到的。为了寻找这种地方，曾经白白地花掉我不少时间，如果详细指明出处，我这些时间就省下来了。

核对原文并不是对批判者表示不信任。有意识的伪造是很少发生的。但是马虎的引文却很常见，就是最谨严的人，也可以在抄录的时候看漏一个字，或者没有看出一处印刷错误。这主要是因为，单就一个命题本身来看，所表示的意思往往很少。这个命题应当怎样理解，原作者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意思，要在这个命题所处的联系中才能弄清楚。把这种联系也引出来，是完全不可能的，那样写出的书就无法读了。但是我们必须设法使独立的、严正的读者很容易找到这个联系，以便核定其中的这个命题实际上是不是有批判者所看出的那个意思。

引证一部著作，还可以有一个理由。任何一部书，都不应当在读者心里引起自满的情绪，使他感到自己现在把需要知道的一切知道了。一部书所产生的最重要的作用，毋宁说应当是使人努力超过自己，引起求知的渴望，唤起一种热忱，要求进一步探索所读的这部书中讨论的各种问题，或者更多的问题。这样，帮助读者，给读者指出某些书来帮他进一步提高，就会成为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引文多是有助于完成这项任务的。

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得到我要想利用的全部书籍。这部书大部分是在维也纳写的，战后维也纳的条件很不利于搜集罕见的外国科学著作。不过，即使全部满足了我对于文献的要求，那也只会延缓本书的完成，扩大它的篇幅，基本思想早已确定，是不会改变的。我只会在某些地方再补充上一些细节而已。

不过我毕竟还是获得了丰富的资料，这要感谢几位朋友把私人藏书供我使用，同时要感谢维也纳工人协会出色的图书馆，它的主任弗里茨·布吕格尔(Fritz Brügel)博士给了我大力的协助。

一系列的社会党都对我的著作很关心，免去了我若干年职务工作的负担，这对我的著作有不小的促进的作用。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对我的著述特别关心，使这部篇幅如此巨大的书有可能极快地付印。

在这里谨向他们一一致谢。也同样要向我的三个儿子费利克斯、卡尔、贝内狄克特致谢，他们各有特殊的专门知识，以建议和行动对我作了帮助。索引出于贝内狄克特之手。

最后我也必须在这里提到我亲爱的妻子，自从我们结婚以来，她以最大的热情参加了我的每一件工作，我事事与她商谈，同她一起校订和整理所有的稿件，尤其是在行文的明白易懂方面，她经常给予我很有价值的指点。这一点对这部书有特别大的意义。

这部书是我一生工作的结晶。它表明了我半个世纪以来据以工作的那种方法。当我学会这种方法的时候，它已经制定约三十年了，它的创始人所取得的丰富成果已经证实了它是非常有效的。这两位大师及其后辈的后来的工作越来越证实了这种效力，同时这种方法本身也得到提炼和进一步发展。因此我现在不仅把它当作我一生工作的基础提出，而且把它当作我一生工作的成果提出来。

我把这样一部书献给那位在我的大半生中与我的终生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女性，我的路易莎。

在我的前半生中，还有另一位女性在极大的程度上给了我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我的母亲。她很早就向我灌输追求崇高理想的热忱。如果我还有可能象我计划的那样写出我的回忆录的话，我将把那部书奉献给她。我今天提到这件事，是因为我必须估计到，看来我已经未必能够完成那部书了。

在我的童年时代，我父母的家庭里仍然充满着 1848 年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我一开始有政治思想，就满怀着对奥地利的憎恨，热

切地希望消灭奥地利，解放被它捆绑在一起的那些民族。

1871年巴黎公社的影响，并没有使我放弃民族解放的目的，而是使我把它扩大成为社会解放。1874年我与社会民主党发生接触的时候，这个目的更加明确了。我在党内并且通过党学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它紧紧地抓住了我，我越是在应用它的时候认识到，它在过去的研究中为我推出了那么多新的真理，它在实践方面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使社会民主党的进军成为几乎不断地胜利的、不可阻挡的进军，我就越是信心百倍地拥护它。

世界大战暂时打断了这种发展。一开始它就不仅使国际陷于混乱，发生分裂，而且使德国和俄国的各个社会党陷于混乱并发生分裂。它在结束以后，在军事崩溃的时期，使千百万没有社会知识、没有社会主义传统、也没有领袖的新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在各个社会党四分五裂的局面之下一拥而入。他们愚昧无知地期待和要求这些党立即实现地上天堂，同时对全部生产设备进行着空前的大破坏。这些社会党没有一个能够用魔术从这一堆废墟中嗅出乐园，这样就增加了许多大失所望的十一月社会党人以及与他们接近的阶层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愤怒；社会民主党已经由战争所造成的分裂闹得软弱无力，这样一来只有更加软弱无力。能力与愿望之间的对立变得越来越大。

由于这个缘故，人们不仅广泛地蔑视和排斥社会民主党，而且蔑视和排斥它的实践所依据的学说——唯物主义历史观。

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否认人的意志的力量，但是它指出，人的意志只有在朝着经济关系所提出的方向活动的时候，只有在谨守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当时可能条件的界限的时候，才能持久地胜利，才是不可克服的。蔑视这些界限的意志，是决不能做出任何持久的事情的，即使取得了一时的成果，并且企图不顾一切地用血腥的恐怖手段来保卫这个成果，最后也必定失败。

由于给意志的作用划定了界限，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在革命时期很容易被没有受过训练的群众和个别利用它的人看成麻痹革命斗

志的讨厌的沉重负担。有些人虽然还追随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在主要之点上把它解释得适得其反。另一些人则把它完全抛弃，宣称一种无基础、无限度的意志只要足够坚决就是无所不能的。

现在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激动开始平息了。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反常现象开始重新让位于正常的经济关系了，在这种关系里，经济规律的力量已经重新发挥出来。同时劳动群众的分裂也日益停止了。尽管暂时反动势力还很盛，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已经在开始重新增长，并且在重新进行那暂时中断的胜利进军了。但是这一进军并不意味着1914年以前开展的那个运动的单纯继续。

革命并不是无影无踪地过去了。它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比以往更有成效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斗争；它使过着小资产阶级生活的广大群众无产阶级化了，使漠不关心、胆小怕事的广大群众关心政治和社会，对自己的力量有所认识了。这一批新的群众一旦充分组织了起来，受到了训练，他们参加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里，一定会使党成为不可抗拒的，并且使党获得强大的政治势力。在那些使党有可能立即朝着劳动解放的方向迈开大步的经济条件之下，党是会获得这种势力的。

随着对旧社会民主党的信任的日益增加，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之为实践依据的那种旧学说的兴趣，亦即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学说的兴趣，也必定重新增长和发展。社会民主党的迅速增长的势力，将容许党立刻去做许多事情，为了使党的实践能够把这些事情进行到最大限度，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使群众通晓唯物主义历史观。

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是纯粹学院性的事情。推广这种理解，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取得社会主义成果的一个重要实践条件。

希望大家不要对我发生误解。我并不是说，承认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参加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个党必须对每一个愿意参加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参加反对一切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人敞开大

门,不管他的这种意愿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理论基础上面,是唯物主义的,康德主义的,基督教的,还是什么别的。

但是按照我的信念,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确为进行这一斗争并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最有效果、最有成效的方法。当然,这只是当它不仅得到承认、而且被人们掌握并加以妥善应用的时候。

即便是最伟大的真理,如果把它归结成几句口号,并不亲自思考,并不研究实际,就把这几句口号机械地照样搬来加以应用,那也会产生不良的恶果。

如果我能够通过这部书唤起了大家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兴趣,使大家认识了其中所包含的许多问题,推广了对于它的明确理解,并且阻挡了各种对于它的生搬硬套的应用,那我就感到无比幸福了。

我给这部书提出的任务,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促进劳动人类的解放。但愿它能担当得起这项伟大的任务!

卡尔·考茨基

1927年9月于维也纳

总 目 录

第一部 自然界和社会

- 第一卷 精神和世界..... 中译本第一分册
- 第二卷 人性..... 中译本第二分册
- 第三卷 人类社会..... 中译本第三分册

第二部 国家和人类发展

- 第四卷 阶级和国家(上)..... 中译本第四分册
- 阶级和国家(下)..... 中译本第五分册
- 第五卷 历史的意义..... 中译本第六分册